

叙事研究与“日常民俗志实践”

—日本旧产煤地筑丰的遗产与记忆¹

川松明

KAWAMATSU Akari

翻译：沈燕

1. 前言

对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来说，田野调查与访谈是研究中最基础的部分，同时也是该学科领域认识论的本质部分。通过日本学者对德国民俗学历史、教育方面的梳理[森 2009、及川 2014]可知，战后德国的民俗学一边吸收社会学方法及文化人类民俗志²的方法，一边不断完善这些方法论与认识论。

顺便提一句，在调查地，笔者常常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只有当地人才在实践民俗学”。这似乎不过是一种最初的模糊感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越来越得到确认。

与之相关的观点得益于 Brigitta Schmidt-Lauber 有关民俗学方法论的讨论。她在有关田野调查与访谈的论述中提到，将访谈视为埋藏于民俗志实践中的东西。她一边强调民俗志的实践必定伴随着再归性、开放性和过程性，一边将带有这些性质的访谈称为“民俗志访谈”（Schmidt-Lauber 2012：567-568）。

考虑到这一点，笔者在调查地遇到的人，确实都成了“民俗志访谈”的实践者。他们从事着田野调查，与当地历史及相关人员接触，并倾听那些故事。而且他们也会对自己现在的意识进行反思，这样的实践每每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像这样，调查地的普通大众常常将这些实践作为毕生事业来经营，本文将这些实践统称为“日常民俗志实践”。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将讨论以下两组问题。（1）当地各种各样的“日常民俗志实践”产生于怎样的社会背景中。它们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又创造出什么样的访谈和田野调查。另外，这其中又创造出什么样的叙事。（2）笔者本人以来自东京的研究生的身份进入田野，在进入当地人“日常民俗志实践”的过程中，是否又产生出新的访谈场景。本文以调查地自2005年以后开始的世界遗产申报运动过程为中心对这两组课题进行研究。通过以上课题，立足于当地民众“日常民俗志实践”，本文尝试探索民俗学者在传承过去事件记忆这一时代要求中能发挥何种作用。

2. 调查地概要：在筑丰收集煤矿叙事的意义

2.1 筑丰地域与煤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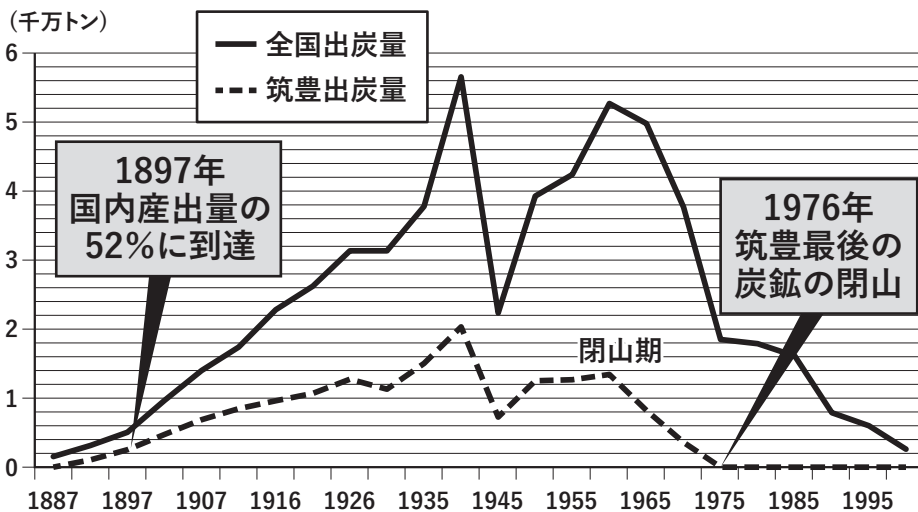
九州是日本西南部的的主要岛屿之一。笔者的调查地筑丰，位于九州地区北部，是福冈县的旧产煤地。截止2016年7月，筑丰的人口为41万3427人[福冈县企划、地域振兴部调查统计科online:《人

口移动调查 第1表 平成28年(2016年)]]。笔者通过口头传统研究(オーラリティ研究)、叙事研究(ナラティブ研究)的视角,来探寻筑丰地区现存的有关煤矿历史的历史是根据谁、又是如何被叙事的。2016年4月,笔者开始按照一年的长期田野调查计划进行调查。另外,从2013年开始,笔者已经对调查地有过数次的访问及短期的田野调查。

“筑丰”这一地名,原用来指称日本刚步入近代化时期时福冈县北部的煤炭产地。40年后的今天,该区域全部的煤矿都已开发殆尽,只留下“筑丰”这个行政区划的名字,其所指的区域比原来实际的筑丰煤田要稍微小一些,但如果考虑到这一地域名称的来历,可以说“筑丰”与“煤矿”有着无法分割的密切关系。德国民俗学界的Albrecht Lehmann开展了作为意识分析的叙事研究,他认为在当今民俗学界进行的叙事研究时,“要把行动、体验的人摆在中心位置”,而在意识分析中,为了“追问那些人的现在,进而追问他们个人的历史、所处环境的历史,以及大的历史是如何为个人所经历并理解的”,就特别需要重视自传式的文本[Lehmann 2010: 33]。作为意识分析的个案,Lehmann收集了有关“森林”的经验谈及回忆,围绕对德国而言具有象征意味的森林,描绘出德国的国民意识[Lehmann 2005]。如果在筑丰这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实施这样的研究计划,那么我们应该选择的象征符号无疑就是“煤矿”了。然而,收集有关煤矿的自传性叙事未必容易。为了弄清筑丰煤矿的历史背景,下面将对筑丰与煤矿的关系史进行简要概述³。

以远贺川这条巨大的河流为支撑,筑丰自古以来便以农村地域发展起来。这里真正成为近代煤炭产地,是在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本土资本及中央资本煤炭产业的进入与发展,1897年筑丰的煤炭产量超过了全国煤炭总产量的50% (参考表1)。在日本产业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官营八幡制铁所,也以靠近筑丰煤矿为其条件之一设置在了现在的位置,它于1901年开始运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煤矿也被视为“战场”,日本动员了其殖民地朝鲜半岛上的人们、妇女以及联军俘虏,煤炭生产得以继续。日本战败后,为了使日本重整旗鼓,联合国总司令部(GHQ)采取了煤矿优惠政策,于是从战地回来的归国者、因战争而失业的人们蜂拥而至。但是,随着1949年战后煤炭控制的解除、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衰退,煤矿产业陷入极度不景气中。国家也开始转换能源政策,进口价格便宜的国外煤炭及石油,煤矿相继被关闭。就这样,直到1976年筑丰最后的煤矿也开采结束,仅仅在这一百年间,筑丰因煤炭产业迅速崛起,而后又迅速没落。

表1 日本煤矿生产的变迁(笔者在参考[国友2009: 5]、[長弘2012: 78]的基础上绘制而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筑丰煤矿的不景气及其带来的失业、贫困问题,通过大众传媒成为日本全国性的热门社会问题。给它带来转变的巨大契机,开始于1959年福冈县的妇人团体发起的名为“黑羽运动(黒い羽根運動)”的募捐活动。这一活动一经媒体报道,筑丰的封山地带忽然间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1960年,两本象征性的书籍得到出版,书里刻画了在煤矿相继关闭中挣扎的筑丰形象。这两本书分别为摄影家土门拳的写真集《筑丰的孩子们》(『筑豊のこどもたち』)以及纪实文学作家上野英信的实录《被追赶的煤矿工人》(『追われゆく坑夫たち』)。上野先生的亲戚曾告诉笔者,这两部作品常常受到人们的批判,因为它们使“筑丰”的形象变得灰暗。今年,为筑丰地区的孩子们设立的社会服务团体“学生队(学生キャラバン)”也已开始启动[筑丰煤炭矿业史年表编纂委员会编 1973: 575]。筑丰,被战后正式进入复兴期、实现高度经济成长的日本所遗弃,成为“文明中的偏僻地带(文明の中の僻地)”[永末 1973: 227]并确立起这一不光彩的地位。

此后筑丰的负面形象也没有得到消除。关闭煤矿后的筑丰,得到了国家大量的补助金。据当地住民所说,这一方面给失业者提供了工作岗位,但另一方面又产生出类似补助金争夺战的东西,也使暴力团体等开始发挥作用。采矿带来的地基下沉也很严重。1969年开始连载的人气作家五木宽之的小说《青春的门(青春の門)》也曾被多次电影化、电视剧化,为在全日本推广筑丰的固定形象做出了贡献。这部小说描绘了暴力、歧视及贫困交织在一起的筑丰并将之与思春期少年的忧郁心情重合在一起,随后被拍成电视剧。

通过对上述历史的追溯可知,煤矿成为了以上地域负面形象的象征符号并且持续至今。尽管煤矿对筑丰而言是不可分割的存在(某煤炭纪念馆馆长曾反复表示,“(筑丰)有煤矿的DNA”),但据说很多常年居住于此的住民会在表面上隐藏自己的筑丰出身,他们并不想谈论有关煤矿历史的话题。笔者在调查中,也到处听到过这样的话。当被问及出身地时,他们会用“福冈”来敷衍过去,这是住民最早在谈论地域与自己关系时的一种表达方式。此外,笔者只是介绍自己说在做煤矿调查,就有乡土研究者皱起眉头说“我不喜欢煤矿。”

因此,关于煤矿叙事的收集工作,在筑丰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尽管如此,笔者也仍常会受到当地住民的欢迎。有好几位老人,他们眼里闪烁着光芒,连续不断地讲述与煤矿相关的自身经历。为什么现在有关筑丰煤矿叙事的收集研究成为了可能。因为这能反映出当地在2005年之后的极为现代的社会状况。

通常情况下,为当地居民所认可,并使他们改变对煤矿的看法及谈话方式的直接原因,是围绕世界遗产开展的地区运动。因此接下来的内容,将介绍筑丰周边地区申报世界遗产的经过。

2.2 世界遗产申报运动与投向煤矿的目光的变化

2015年,“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钢铁、造船、煤炭工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遗产群有两个特征,其一是以产业的近代化为主题,将散落各地的多种资产关联起来,形成了系列提名的形式[木村2014: 218],其二是从写推荐书的调查阶段开始,就与多位海外专家有了密切联系[山本作兵卫氏的煤矿记录画及记录文书的保存、活用等的研讨会2012: 3]。随着来自外部的各种各样的新目光不断投向筑丰,该遗产群的世界遗产申报运动过程也开始影响筑丰地域内部对煤矿的看法。

根据产业遗产相关书籍的著者、社会学者木村至圣的观点,在日本,最初采用“遗产”这一概念来形容煤矿这类近代以后建立的设施,大概是从1980年代开始。1990年,文化厅提出“近代化遗产”的概念,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查。1996年,根据修订后的文化财保护法,近代建筑物可作为文化财列入遗产名录。并且到了2007、2008年,经济产业省将“近代化产业遗产群”列表以33个故事⁴的形式公开发表。但另一方面,对“近代化遗产”和“产业遗产”的关心,并非仅仅是中央行政主导的结果,这也是由1980年代以来将之作为城市建设、城市振兴资源的一部分来关注所引起的[木村

2014 : 3-4]。

对筑丰来说，像这样将近代化的痕迹视为“遗产”的活动，最初开始于周边地区。2006年，九州、山口的6县8市为申报世界遗产选出13个遗迹，并将之作为候选名单，以“九州、山口的近代化产业遗产群”为名向文化厅提出提案。[木村2014 : 218-219、安苏2010a : 1]。对此作出反应的，是曾经作为筑丰煤田主要都市之一的田川市。三井矿产自进入田川市以来，直到1964年，一直以矿井形式进行大规模煤炭开采。三井田川矿业所的旧址，现已开发为“煤炭纪念公园”，内设有田川市煤炭历史博物馆（石炭・歴史博物館）。以下是根据博物馆馆长安苏龙生[安苏2010a、2010b、2012]的记述所整理的田川市申报世界遗产的经过⁵。

煤炭纪念公园内残留着两个烟囱和矿井，在6县8市的共同提案书里也提到应对这类遗迹进行讨论。而也就在这一年，就任田川市煤炭、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安苏看到了这个地方，他认为包含在该遗产群里的八幡制铁所正是在能够获得筑丰煤矿的条件下才建在了现在的位置，因此筑丰的这两个烟囱和矿井，理应作为申报对象，由此开始了将田川市的资产追加进共同提案遗产群里的活动。首先，在共同提案约一个月后，以“以申报世界遗产为目标！将矿井和烟囱传承给后代”（「世界遺産登録をめざして！ 竪坑槽と大煙突を後世に伝える会」）为题召开紧急住民誓师大会。该大会召集了200名住民。随后，文化厅对6县8市的共同提案书给予“继续审议”的评价⁶，田川市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并加入了这一举措。2008年，“九州、山口近代化产业遗产群”世界遗产申报推进协议会成立，该协议会底下还设立了专家委员会。

在申遗过程中，当地的青年会议所捐赠了用来点亮矿井的LED灯，从市民层面来看，其关心度也得到了提高，各种支援活动应运而生。另外，位于市内的福岡县立大学还开展了“以世界遗产为目标的旧产煤地田川的再生事业——产、官、民、学”项目，作为该项目的一环，还邀请各类专家前来召开“世界遗产田川国际研讨会”。来自海外的专家多次考察了田川地区的40处与煤矿相关的遗产。到了2009年，九州、山口的近代化产业遗产群再度进行提案，并被列入世界遗产产地国内暂定名单（世界遺産候補の国内暫定リスト）中，而田川市的两处资产也被列入其中。

但是随后，文化厅又提出了几个问题，并在2009年10月举行的专家委员会上，决定将田川市的资产排除在世界文化遗产的构成内容之外，并将之降级为关联资产（関連資産）。其主要原因在于筑丰残留的煤矿相关资产太过部分与分散。另一方面，安苏表示，提案书中也提到了要重视筑丰煤田的历史。特别是提案书中提到：

20世纪初，筑丰煤田在日本最大的煤田中成长起来，而三井田川矿山又在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残留下来的伊田矿井最初开凿于1905-1910年间，被称为日本的三大矿井（三大矿井都在筑丰地区），其由俯瞰田川市煤炭纪念公园时看到的一个矿井及两个红砖烟囱组成。这两个象征性的烟囱诞生于1910年的伊田矿井，在日本最受人们喜爱的民谣《炭坑节（炭坑節）》中也被这样唱道，‘因为烟囱太高了，想必月亮先生都要被呛到了吧’，继而永远得以流传下去。这样的无形文化遗产在很大意义上成为了社区认同及尊严感的基础。山本作兵卫的煤矿绘画是日本煤矿记录画的代表作，它描绘了煤矿社区生活的全貌。其杰出的作品现被收藏于田川市煤炭历史博物馆，且正在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史料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引用自安苏2010a : 3]

据安苏[2010 : 2]所说，这个专家委员会中有数位海外专家就山本作兵卫的画作与“世界的记忆”做了相关发言。

“世界的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开始的项目，旨在保

护重要的记录遗产，对其保护路径提供援助，并提高这些遗产的世界认可度[Edmondson, 2002]。现在的日本，通常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三大遗产事业”即世界遗产、世界无形文化遗产及“世界的记忆”一起组合成“世界遗产”。但在2009年，日本还没有与“世界的记忆”相关的案例，也没有制订针对这一申报的相关制度。其在日本的认知度几乎为零。

在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海外专家来田川考察，碰巧遇到田川市美术馆和博物馆举办的山本作兵卫的画展，由此山本作兵卫的煤矿绘画作品给海外专家留下了印象[安苏2012: 2]。正如上文引用的专家委员会在提案书里提到的那样，筑丰煤矿被认为资产较少，很难作为“近代化产业遗产群”的一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尽管如此，其历史重要性及其在社区中的价值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并且，简直就像是申报文化遗产的代替方案，虽然筑丰被排除在了构成资产之外，但同时为山本作兵卫煤矿记录画申报“世界的记忆”一事又在田川市提上了日程。从那时起，田川市的目标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转向了“世界的记忆”。就这样，2010年3月，山本作兵卫的煤矿记录画及记录文书共697件，以田川市与福冈县立大学共同提案的形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的记忆”。2011年5月，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查，“山本作兵卫作品集(山本作兵衛コレクション)”被认定为“世界的记忆”。此外，在山本作兵卫作品集申报成功四年之后，2015年，由九州、山口各地发起的申报运动近代化产业遗产群，也以“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钢铁、造船、煤炭工业”为名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以上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笔者以为以下四点很重要：①筑丰煤矿在围绕日本近代化的历史叙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煤矿是身份认同的基础，但这一点却是由海外专家向当地提出的。由此，②在筑丰地区，煤矿得以作为值得自豪的“遗产”受到人们的关注，③但是，显然筑丰地区并没有留下明显的“遗产”，④话虽如此，该地区却存在着各种各样被讲述着的有关煤矿时代的“记忆”，并且也展示出保护、保留这类煤矿“记忆”的重要性。

与筑丰煤矿密切相关的两个世界遗产的诞生，似乎正在逐渐消解当地住民将其自身或地域与煤矿历史联系起来讲述的抵触感。此外，2014年、2015年，在日本代表性的电视剧系列、NHK连载电视小说中，筑丰的煤矿不断被提及。由此，前来筑丰观光的游客逐渐增多，同时这也加速了谈论煤矿的抵触感的消失。比如，筑丰内某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笔者说，至今为止都没提过有关煤矿的事，但最近因煤矿受到了关注，突然之间就变得可以谈论了，她自己的叔叔也是其中一员。

另外，人们也越来越关心那些了解煤矿时代的市民了。虽然筑丰最后的煤矿大约是在40年前关闭的，但事实上，从1950年代开始筑丰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煤矿就开始陆续关闭了。因此现在，即便是在筑丰，也有大半的人是不知道煤矿的，他们开始想要学习煤矿的历史。笔者以为，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市民的新的“日常民俗志实践”。

如今对煤矿的关心日益高涨，各种活动也应运而生，在此笔者将主要介绍两项活动。首先是田川市煤炭历史博物馆馆长安苏举办的讲座“煤矿的讲述者(炭坑の語り部)”，该讲座从200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5年。该讲座通过将过去在煤矿工作过的有经验的人聘请为讲师，继而来听取和记录与煤矿相关的经历。在这个讲座中，安苏成了访谈者，访谈也成了参加者所看到的样子。据说为了讲座顺利进行，安苏会对讲师进行事前采访。这个讲座也可以说是博物馆馆长安苏开创的访谈场所。于是在这里，包括参加讲座的笔者在内的听众，作为这个亦可称之为“公开访谈”的观众，自己本身也在进行着某种民俗志实践活动。

另一个实践活动是在筑丰各地举行的“城市步行(まち歩き)”活动。笔者在调查中也曾参加过几次。这类城市步行活动可以说是有着双重意味的民俗志的实践。第一，它意味着在活动举行前，担任导游的市民，他们自己会去访问当地并做访谈。田川市的城市步行活动，市民们需要历时一年接受博物馆的导游培训，随后才能担任导游。在这里，导游们就各自负责的景点进行调查，并对景点

说明内容进行思考。听了人们在城市步行活动开始前的会议上的对话以及当天的导游讲述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很多导游为了创作自己的讲解而去到现场调查、访谈。第二，它意味着在城市步行途中进行的对话，不仅使参加者也使导游自身重新学习了当地的历史。比如在上述田川的城市步行中，导游解说道，“这个城市曾经是煤矿城市，那时候这里有很多电影院”，一名参加者紧接着说道，“我记得小时候还去过那里”，有人接着问道，“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啊”，随后就产生了导游和参加者们一起聆听那个人的经验谈的场面。另外，某导游在途中说道，“这里曾经有个联合军俘虏的收容所”，随后为了确认这一事实便开始询问同行的博物馆馆长及在当地遇到的市民。此时，他既是向笔者说明俘虏收容所的导游，又是对这一历史进行调查的采访者。

在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筑丰煤矿历史的重要性及保留煤矿相关“记忆”的意义被不断加强。这不仅把迄今为止对煤矿抱有负面印象以及对此毫不关心的人囊括了进来，而且也为很多人开辟出参与民俗志实践的道路。如今，谈及煤矿相关经验的叙述者一方的障碍已被消除，关于煤矿的谈话也变得容易。虽然现在这仍是少数派，但想要询问并了解煤矿的市民也在增加。当访谈者和讲述者的关心一致时，类似城市步行这样的市民实践活动就能成立。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笔者的调查也是在当地住民孕育出来的这类“日常民俗志实践”的基础上成立并获得进展的。

3. 逐渐消失的痕迹及多种多样的“日常民俗志实践”

3.1 煤矿画家山本作兵卫的诞生背景：

煤矿关闭与作为生活方式的“日常民俗志实践”的存在

人们常常这样评价山本作兵卫的煤矿记录画，这些画作以惊人的“记忆”力详细“记录”下了正逐渐消失在眼前的煤矿世界。艺术家菊畑茂久马对山本作兵卫的画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山本作兵卫并非是将模特置于眼前而是通过“超群的记忆力”来作画的[菊畑1994：19-25]。受此影响，福冈市博物馆馆长有马学总结道，“作兵卫的画，正是从绘画对象消失的瞬间开始的。”[有马2014：16]

对山本作兵卫画作的这样的评价，与筑丰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的构成资产中被除名到山本作兵卫的煤矿记录画得到关注并被成功申报为“世界的记忆”这一过程有重合的地方。在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筑丰煤矿的遗迹大多已经消失，此时山本作兵卫的画作和文章就受到了关注。并且，已经没有了煤矿存在的遗迹，这一认识也与笔者在调查中到处都可以听到的当地住民所说的“什么都没有了”相呼应。

接下来，将介绍两则住民的叙事，其传达着什么东西“消失了”。其一，与直方市的“煤矿工人像(坑夫の像)”相关的叙事⁸。直方市是筑丰的主要城市之一。这座雕像原本位于直方车站前，曾是产煤地直方市的标志性建筑。一名现在在车站附近经营咖啡店的女性说，看到煤矿工人像，就觉得回到直方了。然而1996年，市政府却计划迁移煤矿工人像。直方乡土研究会针对直方市政府开始了反对运动。其他市民团体也加入了反对运动，且这些运动也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支持。但最终，雕像还是被迁到了市民们异口同声说“谁也不会去”的人迹罕至的地方，车站前则设置了新的纪念碑。如今，对乡土研究会的成员及其他关心地域历史、城市建设的市民来说，“煤矿工人像”迁移的始末已成为了特别热门的话题。尽管如此，乡土研究会会长有时还是会对朋友们说，“现在大家都说煤矿工人像的迁移真是太可惜了，但当时我们发起运动的时候，几乎谁也不关心。”谈及煤矿时，会长常常会强调过去市民们对煤矿是如何歧视。当煤矿对大多数市民来说只是唤起负面印象的存在时，那些想要把“煤矿工人像”作为地域象征保留下来的市民运动，还不具备改变行政决策的力量。

倒不如说，为了摆脱从煤矿相继关闭后开始的持续性的地域混乱、衰退形象，筑丰曾有的煤矿

的痕迹，迄今为止都在被陆续抹去。第二个例子，是被频繁提及的筑丰煤田的象征性风景即三角形的山“ボタ山(botayama)”的叙事。开采煤矿时，除了煤矿之外，一些石头或质量不好的煤炭也会被一起挖出来，选煤之后，这部分废弃物就会被扔掉。这些在筑丰就被称为“ボタ”，ボタ逐渐堆积起来就成了“ボタ山”。直方市煤炭纪念馆馆长在给参观者介绍时，就会讲述ボタ山的历史。煤矿关闭后，ボタ山被当作建筑用的石材被低价买入，山被削平了，遗址上也建起了工业园地。然后馆长会以结果“500多座ボタ山全部消失了”来结尾。这样的叙述也象征性地表明，为了摆脱产煤地的形象，眼睛可见的煤矿痕迹是如何在筑丰被抹去的。而且这样的叙述，也与很多当地住民讲述的有关ボタ山的叙事有着共通之处。

与现在住民们的关注点不同，以上两则叙事告诉我们以前筑丰的人们是如何消除产煤地的痕迹的。但很多人在消除这一痕迹的过程中，也会变得像直方乡土研究会的成员们一样，开始想要继续保留下这些遗迹，这也是事实。特别是，这样的转变似乎在记录煤矿工作人员人生经历的活动显得特别突出。这些实践者走访了过去在煤矿工作的劳动者，倾听他们的谈话，收集他们的劳动工具、画作、文章以及他们拍摄的照片。因此，想要将逐渐消失的煤矿“记忆”“记录”下来，这样的尝试绝不仅仅是从一系列的世界遗产申报运动或“山本作兵卫作品集”开始的。不如说，画家山本作兵卫也正是在筑丰“日常民俗志实践”中诞生的。

山本作兵卫(以下称为“作兵卫”)诞生于1892年的筑丰。据说从7岁开始就下煤矿了。1906年，14岁的他开始了煤矿工人的生活，直到1955年他所工作的煤矿关闭，在这5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辗转于筑丰的各个煤矿谋求生计。之后，1957年，他开始在关闭了的煤矿担任夜间警员的工作，期间他开始在日记的空白处或广告纸的背面画有关煤矿的画。1961年，他所在单位的矿业所会长发现了这些画作并开始推进出版计划。到了1963年，作兵卫的第一本书《明治·大正煤矿绘卷(明治 大正炭坑絵巻)》出版。当时正是煤矿相继关闭的时期。(田川市煤炭历史博物馆、田川市美术馆2008、森本2008、田川市online：“山本作兵卫氏 煤矿的记录画”。

之后，作兵卫的身边聚集起了很多人。其中最重要是乡土史学家、曾经的田川市立图书馆馆长永末十四雄。1964年，永末在田川乡土研究会发起了“煤矿资料收集运动(炭鉱資料収集運動)”。作兵卫对此表示赞同并开始创作新的画作。安苏曾告诉笔者，作兵卫对伴随煤矿终结的记录运动产生了共鸣。直到很久以后，当时作的画才被列入“世界的记忆”的一部分。

另外，在此笔者想通过“日常民俗志实践”观点来强调的是，与作兵卫来往频繁的记录文学作家上野英信的存在。通过上野的介绍，1967年，NHK电视台对作兵卫做了报道。上野说，正如所想的那样，作兵卫没能上学，但他在晚年时居然能留下如此多的记录，这深深打动了她[上野2012：38]，而上野的生活方式确实可以说是尽其一生贡献在了煤矿劳动者的田野工作中。他和家人一起，移居到了筑丰的小镇鞍手町，一生都在追随煤矿劳动者的身影。作兵卫边喝酒边跟上野讲述着，还唱了煤矿劳动歌给他听。

于是在上野周围，也可以发现很多和他一样将一生都奉献在“日常民俗志实践”上的人。比如，通过对女性煤矿工人的访谈来写书的作家森崎和江[森崎1970]，把对女性煤矿工人的访谈、记录当作毕生事业的当地住民井手川泰子[井手川1984]，出生在筑丰的神社中、且一直都在追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朝鲜人被强制连行这一段历史的林えいだい(如：林1981)，此外还有很多以永末、安苏为代表的乡土史学家，以及一直想要教授学生地域历史的学校教员等。对这些人来说，行走在煤矿痕迹不断消失的筑丰的土地上，聆听带着煤矿时代记忆的人们们的故事，已经成了他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从1970年代开始，井手川就持续对曾在煤矿工作过的女性煤矿工人进行了访谈记录，在那本著作的开头，她提及了一位女性煤矿工人的死亡并做了如下描述。“女性煤矿工人确实正在一个个逐渐老去。タカ(Taka)女士的去世，让人感受到筑丰在某种意义上的终结，也告诉我

们很多东西。对她来说，筑丰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寻求这个答案，我想我要继续走下去。”[井手川1984：10]。这里展示了井手川不断前行以寻求女性煤矿工人故事的实践。那就是她的生活方式。在筑丰，除了那些如今被认定为“遗产”的遗迹之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记忆”，比如很多人在煤矿的劳动或生活，女性在煤矿里的劳动，朝鲜人的强制劳动，还有煤矿关闭及之后的混乱等等。而且，很多人真正行走在筑丰、聆听人们的故事并“记录”下来，这种“日常民俗志实践”在这片土地上扎着根。作兵卫是这类民俗志实践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之一，此外他也是主动参与实践的实践者。在筑丰，除作兵卫之外，在这样的“日常民俗志实践”中发现的人才还有很多。比如上述“煤矿资料收集运动”的重要支持者之一、原煤矿劳动者的摄影家桥本正胜（田川乡土研究会1965：53）。在那场运动中，桥本捐赠了50张ボタ山的照片。现在，桥本仍边用自己拍摄的照片边讲述着煤矿的故事。

以上内容对山本作兵卫与矿山关闭之后一直存在的“日常民俗志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笔者的调查，也多被认为是想要“记录”该地区正在消失的“记忆”的一种实践。而且笔者想要探寻的是生活在筑丰的人的“日常民俗志实践”、世界遗产申报运动后最近高涨起来的对“记录”煤矿“记忆”的活动的关心，以及现在当地住民围绕煤矿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可以说，笔者的调查正是在上述笔者自己的兴趣点上实现的。

3.2 支持叙事研究的“日常民俗志实践”：把纪录片摄制现场当作田野调查地

筑丰各种各样的“日常民俗志实践”与笔者自己的兴趣点交织在一起，以在这种交织中产生的采访现场为例，下面将介绍一个电视节目。那就是在NHK的BS频道播放的纪行纪录片节目。这期节目的播放时间为2016年6月24日晚上9点和7月1日早上8点。时长约为1个小时。节目中播放了笔者的调查。

该节目是一个纪行纪录片系列节目，它每期都会以日本国内的某个特定地域为主题，介绍当地的风土、节日、人们的生活或营生，由几个小故事的集锦形式构成。笔者刚开始进行长期调查时，恰好遇到该节目组以“筑丰”为主题来进行拍摄。完成的节目由9个故事构成，其中第5个故事，时长约为9分钟，就是围绕笔者的调查制作的故事。结果出来的故事，是在节目制作者、当地人及作为调查者的笔者本人的互动中完成的。

首先，说明一下构成这个故事的五个场景。场景1：熟悉煤矿的Y先生与一名研究生（笔者）一起去看一个煤矿坑口的场面；场景2：介绍这名来自东京的研究生为了在筑丰做田野调查而搬到了这里；场景3：她前去聆听一位有煤矿经验的高龄男性讲述他的故事；场景4：她前去拜访一位因煤矿爆炸事故而失去丈夫的女性；场景5：研究生发表评论的场面。其中场景1、3是在既有的“日常民俗志实践”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拍摄现场。

场景1是笔者在Y先生的带领下前去参观煤矿遗址的场面。在节目里，这个场景的画面是在与当地及Y先生同行时，研究生在山中发现了过去煤矿的坑口遗迹，通过这一画面，这一场景被编辑为用来说明过去的这种小坑内的私自开采行为是如何进行的。在这个短暂的场景里，我们也得以理解Y先生“日常民俗志实践”的存在方式。

约在此次采访的10年前，28岁的Y先生得了心脏病，一时不能工作。这时，Y先生开始去图书馆阅读当地的相关资料。特别是他阅读了很多与煤矿相关的书，并开始思考如今那里变成什么样了。为了确认，他一个人跑去探索了煤矿的遗迹。他的田野调查，将航空照片、过去的资料与现在的地图进行对照，并骑摩托车前往煤矿的遗迹处进行确认。有时也会进入相当危险的山林中。在实地调查之后，他会将报告上传到博客上。当初主要是对遗址感兴趣的Y先生，在初次探索煤矿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位曾是煤矿工人的女性。那位女性大声诉说着自己的丈夫在塌方事故中丧生却几乎未能得到任何补偿，她牢牢握着他的手，来回摆动着，并告诉他希望年轻一代能记住那个不合理的时代。

从那时起，Y先生下决心，只要还活着，就要把自己在各地看到、听到的事情继续讲述下去。2014年8月，他告诉笔者，他现在的主要活动就是听别人讲述。

场景1中也能看到Y先生“日常民俗志实践”的多种多样的存在方式。在节目中同行的一位当地住民，也是Y先生在探索遗址的过程中认识的。这次采访的其中一个坑口，就在这位住民家的后山上。此外，通过新闻等大众媒体的报道介绍，近年来Y先生的活动也变得广为人知，活动范围也扩大了。2016年，他开始作为嘉宾教师在当地的小学围绕煤矿遗迹进行授课，除此之外，在年轻教员的研修中，他还边陪同他们参观煤炭遗迹，边介绍自己迄今为止听过的故事。该节目的焦点虽然不是Y先生的实践本身，但他边与当地入闲聊着边进入山道，对过去曾有的煤矿遗迹进行确认，再继续向别人诉说，正是Y先生这样的“日常民俗志实践”支撑着这个场景。笔者发现坑口这一场面，其实是在Y先生“日常民俗志实践”基础上产生的。

场景3也是在几个“日常民俗志实践”的基础上诞生的。这里是有关T先生的场面，他是朝鲜为日本殖民地时来日朝鲜人的第二代，他家后面建有一座松岩菩提的供养塔，塔里供养着祖先的遗骨。在采访中，笔者询问了他有关自身与松岩菩提供养塔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谈到了在日朝鲜人遇到的歧视问题，以及他向很多人讲述自己经历的实践。

T先生访谈背后的“日常民俗志实践”是一场名为“强制连行⁹研究会(強制連行を考える会)”的市民活动。该会的事务局长也是创始人之一的一名男性，就“强制连行研究会”的历史，对笔者做了如下介绍。该会的开端要追溯到1984年一次名为“从‘筑丰’看日本人及在日韩国、朝鲜人历史的访问会(『筑豊』から日本人と在日韓国・朝鮮人の歴史を訪ねる会)”的实地调查。当时的调查地，有一座为煤矿事故中去世的朝鲜人及日本人设立的供养塔，他们还在那里遇到了守护这座供养塔的市民。以此为契机，1985年“强制连行研究会”成立。该会仍坚持在一些供养塔中供养强制连行的牺牲者，以及为了将留在日本的韩国、朝鲜人的遗骨送回他们的故乡而继续进行调查活动。此外，该会还在继续学习从朝鲜半岛强制连行带来的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史，它每年必定会举办的活动就是筑丰的田野调查。对事务局长来说，最重要也最令人兴奋的实践就是实地调查前的预调查，与陌生人初次见面并进行访谈。1992年，在一次预调查中，会员们发现某个煤矿的公共墓地，因建设高尔夫球场而被破坏了。这个墓地里不仅葬着日本人，也葬着韩国人、朝鲜人。他们与当地住民一起，发起了建造供养塔运动。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T先生。T先生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到供养塔的建设中，之后作为遗族开始讲述供养塔的故事。很多媒体及人权教育负责人开始来采访T先生。1998年出版的福冈县人权教育副读本中学生版中，就刊载有以T先生为原型创作的《爷爷的眼泪(おじいちゃんの涙)》一文[同和教育副读本作成委员会1998]。

T先生在节目的采访中也说，因为现在要去给小学生或中学生讲述自己的经历，为了上课就很忙。在这个场景中，T先生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给在煤矿中死去的人帮忙火葬的事情，还讲了日本人与朝鲜半岛的人在埋葬方式上的不同等。可以想象，这是T先生至今为止已经反复讲述过无数次的经历。事实上，放映出来的这一部分，并非是笔者采访时的场面，而是NHK事前去T先生那里取材时录制的内容，但这个内容与他对我说的内容大致是一致的。对T先生的采访的实现，是“强制连行研究会”经过30年以上的“日常民俗志实践”的结果。而且“日常民俗志实践”作为“强制连行研究会”的市民团体活动，开始扩展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现场中。对笔者来说，T先生讲述的故事，正是在这样各种各样的“日常民俗志实践”中中年累积建构起来的故事。

与建立在已有“日常民俗志实践”基础上的访谈场景1、场景3相对，场景4的访谈，则是由笔者和节目导演共同创造出来的新场景。导演介绍了这样一个职工住宅区。筑丰最大的煤矿事故曾造成200多人死亡，事故过后，那些在事故中失去丈夫的女性被集中安置在了这里。计划是采访住在这里的亲历者S女士。导演事先就得到消息说，住在这里的女性都不愿意谈论煤矿爆炸事故这一话题。

尽管如此，当S女士回答说可以时，导演结合笔者的研究课题，提出要将焦点放在“这一事故在遗族中是如何被记忆的，这是否为有着相同境遇的人所共有，另外，对外面的人讲述这一记忆是否会觉得痛苦”。

笔者一行人来到S女士之前住过的职工住宅区前，开始了采访。S女士确实没有拒绝访谈，她回忆了事故发生时的状况及事故后搬家的原委，但她并没有说得很详细，她总说“不知为何，就变得乱糟糟的”、“不知道”之类。这样混乱的话语背后，实则传达出事故后遗族是处于怎样的混乱状况中。但从叙述形态（語り型の型）来看，还可以发现别的问题。在采访的后半段，问及有没有跟家人、朋友说起过这起事故时，S女士回答说至今为止她一次都没跟人说过这个事儿。关于这起事件，S女士的叙述形态原本就不存在。而从她口中听到的生动的描述则是事故后抚养孩子的经历。如果就这样继续听她讲述育儿的故事，那么我们也就能听到S女士丰富的叙事了。但考虑到是在摄像机前，笔者就没有再问这类与“调查课题”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就这样，在笔者、导演、S女士三人不合的对话中，采访结束了。在对S女士的访谈中，笔者应该依赖的既存的“日常民俗志实践”并不存在。为此，笔者和导演将“讲述煤矿的记忆”这一不合理的关心，转向了没有讲述过那些内容的S女士。虽然采访时间太短、也不充分，还有些不协调的地方，但围绕“继续讲述煤矿”这一主题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讲述的场景。

在节目中，S女士的采访场景之后，紧接着放映的是笔者走在筑丰职工住宅区里的画面，同时还播放着下面的解说。“消逝在地底的生命。就这样深藏在人们心底，连带着那些正在消失的记忆。”最后，笔者的身影出现，边还说着，我们必须知道有人在继续讲述煤矿故事，也有人不再讲述。虽说导演在采访中也发挥了作用，但这个节目只对笔者作了描绘，笔者被描绘为采访的实践者，同时又是住在筑丰走在筑丰、探寻煤矿“记忆”的民俗志实践的实践者。通过这个小故事可以发现，笔者所进行的活动本身也成了想要“记录”正在消失的煤矿“记忆”，其在筑丰的反复的实践中，已经成了年轻的而崭新的另一种形式。

综上所述，这个节目的制作过程，融合了筑丰地区的“日常民俗志实践”、当下日本存在的对煤矿记忆故事传承的关心，以及笔者研究中的关注点，同时这也是煤矿叙事产生的场所。在这里，笔者以既存的“日常民俗志实践”为支撑，又时不时重新对其进行描绘，继而得以作为民俗志实践的主体浮现出来。而且这里也反复出现着将正在消失的煤矿“记忆”“记录”下来的主题。

4. 结论

虽然节目组的采访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笔者每天围绕煤矿叙事展开的调查，是以那些认为必须将煤矿的“记忆”保留下来的人们的意识为媒介而产生的。而且，笔者进行的一个又一个访谈，在煤矿痕迹即将消失的今天，也被包含进了如何留住“记忆”并继续讲述的实践中。

根据Schmidt-Lauber的观点，本文把在旧产煤地筑丰感受到的像当地人一样在实践着的民俗学的实践视为“日常民俗志实践”，并以此为出发点。为了笔者的叙事研究而收集数据，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后盾的“日常民俗志实践”是不可或缺的。根据本文的论述，本文将以对最初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回答来结尾。

第一个问题是，“日常民俗志实践”产生于怎样的社会背景中，它们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又创造出什么样的田野调查或访谈文化。在筑丰，矿山关闭后，煤矿就被认为是“负面遗产（負の遺産）”，其留下的痕迹也应尽早消除。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一部分市民试图“记录”正在消失的煤矿“记忆”这一实践，且一直持续到现在。特别是那些想要保留下曾在煤矿里生活过的人的自传式“记忆”

的实践者，他们有着成为“日常民俗志实践”主体的倾向。他们在当地到处进行田野调查，访谈煤矿时代的直接知情人，还会收集照片、绘画等叙述“记忆”的资料。最近申报成为“世界的记忆”的山本作兵卫，也是在这类市民实践中成为了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呼应“日常民俗志实践”创作了很多画。

另外，2005年后开始的面向世界遗产申报的各种活动，再次激活了“日常民俗志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现筑丰有可能成为文化遗产的遗迹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取而代之用山本作兵卫来申报“世界的记忆”，这让当地住民了解到筑丰有着珍贵的历史和“记忆”，并认识到保留这份“记忆”的意义。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在逐渐消失的煤矿痕迹中必须保留下煤矿“记忆”这一意识重新得到诞生。这种想法，与矿山关闭后把进行“日常民俗志实践”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们的意识有着重合之处。以城市步行活动为代表，在围绕世界遗产的过程中，筑丰历史的负面印象得到了缓解，比起住在筑丰，更大范围的市民加入了“日常民俗志实践”。而且这种新的“日常民俗志实践”，也在矿山关闭后的各种反复的“日常民俗志实践”基础上开出了花。

本文的第二个问题是，笔者自身的调查与这种“日常民俗志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成立的。正如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那样，作为研究者的笔者的采访，是在当地人的（有时是在大众传媒的）支持下才成立的。而且，在住民“日常民俗志实践”支持下，有时还会产生出新的叙事场景，而笔者自己也成了该地域内存在的民俗志实践的新主体。

并且，不管是当地住民的“日常民俗志实践”，还是卷入其中的笔者的民俗志调查，都与煤矿“遗产”化、煤矿劳动者人生“记忆”化这一时代共存。筑丰“日常民俗志实践”，常常与试图“记忆”并“记录”煤矿的市民实践联系在一起。

如今，记忆传承问题，已经成了诸如战争体验或世界灾害性事件中的社会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当亲历者去世时，如何继承这种经验就成了重大的课题。民俗学不断追问民俗志的方法与认识论，对当地住民的交流方式很敏感并擅长融入其中倾听他们的叙事。听完体验者讲述后的当地住民创造出“日常民俗志实践”这种存在方式，现在，民俗学者所追求的，不正是这种自我学习、继而传承记忆的方式吗？今后，笔者还将思考叙事或其他无法被纸上的记录保留下来的各种记忆的传承方法，一边学习围绕德国不断发展的文化、社会记忆展开的议论及其与民俗学的关系，一边加深自己的思考。

注释

1 原文“The Study of Narrative and “Everyda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Heritage and Memory in Chikuhō, a Former Coal Mining Area in Japan”发表于Johannes Moser (Ed.) 2018, Themen und Tendenzen der deutschen und japanischen Volkskunde im Austausch: Münchner Beiträge zur Volkskunde, vol.46. 本文为该文译稿。最初，本文以“Heritage, Memory, and “Everyda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in Chikuhō, a Former Coal Mining Area in Japan”为题，在2016年10月28日日德民俗学共同举办的研讨会“Perspectives and Positions of Cultural and Folklore Studies in

Japan and Germany”上进行了海报发表，随后才将其写成论文。此次再版，在表达等方面多少进行了修改。但本文论及的田野中的事实、人们的谈话以及对这些的解释，都在2016年笔者执笔本文时所掌握的内容范围内。

2 金贤贞引用文化人类学者全京秀的议论[全 1990: 137-138]，将ethnography由“民族志”翻译成“民俗志”。这并不是为了区别民俗学与人类学。金贤贞阐述的理由是，“因为我同意全京秀的主张，他认为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误解，而且归根结底，对‘文化’进行‘记述’是为了理解‘人’，相比而言‘民俗志’更能表达这一点。”[金 2016:15]本文根据全、金

- 的观点, 将ethnography译为“民俗志”。
- 3 以下有关筑丰历史的记述, 是笔者在参考了永末 [1973]、常弘[2012]的基础上, 根据调查过程中反复听到的知识重组而成的。
- 4 以产业史、地域史为中心展开的故事。——译者注
- 5 在总结这个经过时, 还参考了“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主页上的“明治日本的产业遗产革命online: 距离申报世界遗产的距离”〔明治日本の産業革命遺産 online: 「世界遺産登録までの道のり」〕。
- 6 “继续审议”指共同提案书未能通过文化厅批准。——译者注
- 7 即世界记忆工程。——译者注
- 8 以下有关煤矿工人像叙事的描写, 是笔者在调查中听闻了当地人的叙述, 又参考了《乡土直方: 思考煤矿工人像特别号》直方乡土研究会编 1997 (『郷土直方: 坑夫像を考える特別号』[直方郷土研究会編 1997]) 的记述写成的。
- 9 强制连行, 指的是把抓的劳工强制送往日本。——译者注

参考文献

- 安藤龍生 2010a 「世界文化遺産登録の取り組みから学んだこと、考えたこと」『田川市石炭・歴史博物館だより』7。
- 安藤龍生 2010b 「世界文化遺産登録への取り組み～経過と意義～」『田川市石炭・歴史博物館館報』3。
- 安藤龍生 2012 「『世界記憶遺産・山本作兵衛コレクション』と今後の山本研究への試論」『田川市石炭・歴史博物館館報』5。
- 有馬学 2014 「消滅した(近代)と記憶遺産: いま、作兵衛画の何を問題にすべきか」有馬学、マイケル・ピアソン、福本寛、田中直樹、菊畑茂久馬編著『山本作兵衛と日本の近代』弦書房。
- 五木寛之 2004 『青春の門: 筑豊篇(上・下)』講談社。
- 井手川泰子 1984 『火を産んだ母たち: 女坑夫からの聞き書』葦書房。
- 上野朱 2012 「世界を掘り抜け」『リベラシオン・人権研究ふくおか』146。
- 上野英信 1960 『追われゆく坑夫たち』岩波書店。
- エドモンドソン、レイ 2002 『ユネスコ「世界の記憶」: 記録遺産保護のための一般指針(2002年改定版)』ユネスコ(国際連合教育科学文化機関) 情報社会部、文部科学省HP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other/micro_detail/_icsFiles/afieldfile/2017/02/13/1354665_01.pdf (2018年12月2日閲覧)。
- 及川祥平 2014 「ハンブルク大学民俗学/文化人類学研究所における民俗学教育について」『常民文化』37。
- 菊畑茂久馬 1994 「川筋画狂人・山本作兵衛」『絵画の幻郷: 菊畑茂久馬著作集3』海鳥社。
- 金賢貞 2016 「韓国民俗学は『当たり前』を捉えうるか: 韓国国立民俗博物館の二つの民俗誌(2007～14年)を中心に」『日常と文化』2。
- 木村至聖 2014 『産業遺産の記憶と表象: 「軍艦島」をめぐるポリティクス』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 國友宏俊 2009 「我が国石炭政策の歴史と現状」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 http://www.enecho.meti.go.jp/category/resources_and_fuel/coal/japan/pdf/23.pdf (2018年2月16日閲覧)。
- Schmidt-Lauber, Brigitta 2012 “Seeing, Hearing, Feeling, Writing: Approaches and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in Regina F. Bendix, and Galit Hasan-Rokem(eds.), A Companion to Folklore, Wiley-Blackwell.
- 田川郷土研究会 1965 「会報: 炭鉱資料収集運動」『郷土田川』24。
- 田川市石炭・歴史博物館・田川市美術館編 2008 『二本煙突築百周年/田川市石炭・歴史博物館開館二十五周年記念 特別企画: 炭坑(ヤマ)の語り部 山本作兵衛の世界 584の物語』田川市石炭・歴史博物館、田川市美術館。
- 筑豊石炭礦業史年表編纂委員会編 1973 『筑豊石炭礦業史年表』西日本文化協会。
- 全京秀 1990 「물상화된 문화와 문화비평의 민속지론: 민속지의 실천을 위한 서곡 (物象化した文化と文化批評の民俗誌論: 民俗誌の実践のための序曲)」『현상과 인식(現象と認識)』14 (3)。
- 土門拳 1960 『筑豊のこどもたち』パトリア書房。
- 同和教育副読本作成委員会 1998 『同和教育副読本「かがやき」中学校用』福岡県教育委員会。
- 林えいだい 1981 『強制連行・強制労働: 筑豊朝鮮人坑夫の記録』現代史出版会。
- 永末十四雄 1973 『筑豊: 石炭の地域史』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 長弘雄次 2012 『筑豊の石炭に生きた日々の記憶: 筑豊炭田開発技術史論文選集』文字の花書房。
- 直方郷土研究会編 1997 『郷土直方: 坑夫像を考える特別号』。

明治大正炭坑絵巻刊行会編 1963 『明治大正炭坑絵巻』明治大正炭坑絵巻刊行会。

森明子 2009 「ドイツの民俗学と文化人類学」『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33 (3)。

森崎和江 1970 『まっくら：女坑夫からの聞き』現代思潮社。

森本弘行 2008 「炭坑記録画と山本作兵衛」田川市石炭・歴史博物館、田川市美術館編『二本煙突築百周年／田川市石炭・歴史博物館開館二十五周年記念 特別企画：炭坑(ヤマ)の語り部 山本作兵衛の世界 584の物語』田川市石炭・歴史博物館、田川市美術館。

レーマン、アルブレヒト 2005 『森のフォークロア：ドイツ人の自然観と森林文化』（識名章喜・大淵知直訳）法政大学出版局。

レーマン、アルブレヒト 2010 「意識分析：民俗学の方法」（及川祥平訳）『日本民俗学』263。

山本作兵衛氏の炭坑の記録画並びに記録文書の保存・活用等検討委員会、保存調査検討部会、活用調査検討部会、受入環境調査検討部会、記念式典検討部会 2012 「山本作兵衛氏の炭坑の記録画並びに記録文書の保存・活用等に係る検討結果報告書」、田川市HP http://www.joho.tagawa.fukuoka.jp/y_sakubei/kiji003897/（2018年12月2日閲覧）。

(オンライン文献)

田川市 「山本作兵衛氏、炭坑の記録画」<http://www.y-sakubei.com/>（2018年12月2日閲覧）。

福岡県企画・地域振興部調査統計課 「人口移動調査 第1表 平成28年（2016）」<http://www.pref.fukuoka.lg.jp/dataweb/2016-1hyou.html>（2016年8月18日閲覧）。

明治日本の産業革命遺産 「世界遺産登録までの道のり」<http://www.japansmeijiindustrialrevolution.com/history/index.html>（2016年8月28日閲覧）。